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改革

刘菊素¹, 向勇²

(1.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市 100875; 2. 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 四川乐山 614000)

摘要:袁世凯在清末力主废除科举制度, 大力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积极规划学堂管理, 是清末教育改革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关键词:袁世凯; 清末教育改革; 学堂

中图分类号:G529.52; 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6-0096-05

袁世凯(1859—1916年)是清末民初极具影响的人物。大多数人对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比较了解, 但对他在清末的教育活动却知之甚少。袁世凯在清末的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政府宣布“新政”之后, 到1909年1月被开缺回籍这段时间。伴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施行, 袁世凯力主废除科举制度、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是清末教育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一 力主废除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从隋朝创立沿袭到清朝, 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 也是读书人谋取仕途的重要阶梯。到清末,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重“礼义”的传统教育与内容狭隘的科举考试, 越来越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成为各类实用人才培养与获取的主要障碍。清末有留学生指出: “吾国二千年来, 无普通之教育, 冠儒冠者, 唯以弋取功名之心, 所治者科举之业; 主讲席者, 唯以研求帖括为事, 所督者记诵之功。……名为老师宿儒, 其实学问之程度, 曾外国童稚之不若。”[1]

(31页)科举制走到了穷途末路, 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戊戌维新期间, 光绪下诏废八股文改试策论, 但因维新失败而落空。1901年, 张之洞等人上奏朝廷, 主张变通科举。同年, 迫于形势压力的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 改革教育制度。1902年7日, 清廷谕令废八股, 改试策论。1903年4月, 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 “亦宜酌量变通, 为分科递减之一法”, 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 均按年递减, 务期科举逐渐尽废, 进而广设新式学堂, 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 “俾天下士子, 舍学堂一途, 别无进身之阶, 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 人才接踵而至, 不可胜用”[2](739页)。

袁世凯等人认识到科举制度阻碍了新式学校的发展。自洋务运动以来, 新式学堂在封疆大吏的倡导下虽有所创建, 但基本上是零星星星, 各自为政, 缺乏全局的总体规划。正如袁世凯所说: “中国非无忧时之士也, 而绅民不闻倡建学堂者, 亦以群情注重科举, 父兄以是勸子弟, 乡党以是望

收稿日期: 2000-10-18

作者简介: 刘菊素(1966—), 女, 四川省资阳市人, 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科系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向勇(1965—), 男, 四川省彭山县人, 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

齐偶,但使荣途不失,何暇远虑深谋。”即便朝廷三番五次要求地方官创办新式学校,地方官也大抵观望迁延或敷衍塞责。“盖谓入学堂,亦不过为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就难”,所以,“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士子将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2](737页)。1905年8月,袁世凯再次领衔与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一道上奏,要求清政府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同定国是,外服强邻,转危为安,胥基于此”[2](1187—1188页)。袁世凯等人的上奏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关注。清廷下令从1906年开始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同时要官绅“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科举制度的废除,是清末教育制度的一场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袁世凯等封疆大吏的废科举主张加速了科举制度的灭亡。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封建旧式教育至此结束,一种崭新的、近代化教育模式开始确立。

二 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清末统治危机日重。面对时事多艰,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人才难得,认为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他认为:“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2](735页)“盖兴国大政,莫重于教育人才。”[2](1251页)在袁世凯看来,教育、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有人才则国家富强易于反掌,无人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

袁世凯还认识到“中国腹省风气未开,士民囿于一隅,每至寡闻少见,一遇洋人,非存畏避之心,即起仇视之意”[3](卷九)。以这样的民族、心态、民俗、民风,中国断难立足于世界。袁世凯希望借助学校一途,提高国民素质,开启民智。他说:“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

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成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不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2](1187页)袁世凯看到了学校教育对拔尖人才的培养,又注意到了它对民智、民俗的潜移默化作用,还注意到它与国家兴衰、强弱的密切关系。“政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2](736页)。袁世凯从考察国外情形中了解到发达国家学校遍及全国各地,国民无人不入学,学校愈多而文明愈著的情况。清末虽有洋务派创办的一些学校,但是,大多是急功近利的各类大学堂,规模也极为有限。甲午战前,中国自办学堂25所;1895—1899年,全国兴办学堂约150所。由于缺少师资、经费,中、小学堂还处于起步阶段。基于上述认识和国情,袁世凯力主兴办新式学堂,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一)兴办新式学堂

袁世凯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学生如果不入小学,无以植根本;不入中学,无以扩知能;不入大学堂,终难以集大成而造乎极。1901年9月,袁世凯在奏报中说:“考各国学制,必先由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此通例也。现各属应设之小学、中学堂难以骤成,而省城之大学堂又势难久待。”1902年8月,袁世凯上奏清政府,主张“赶紧兴办小学”,而且拟于直隶州各府设中学堂一处。这就改变了初期以少数学堂取专才的偏差,逐渐设立了大、中、小学堂,为系统完整的教育体制的形成作了有益的探索。

袁世凯的兴学是成功的。截止1907年,直隶共办有学堂8000多所,直隶地区教育初具规模。1906年6月,袁世凯奏报直隶已开办各级各类学堂,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2](1338页),注册入学人数86652人。连同武备、巡警等

学堂,总数不下10万人。据学部1907年统计,直隶办有各类学堂8723所,学生164000余人,位居全国第二。尽管入学人数与直隶2000万人口相比,为数很少,但在学堂初兴的情况下,几年时间里能办出如此成绩还是颇为可观的。由于直隶新式教育发展较快,“官绅协力,风气潜移”,“捐货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3](卷三十九),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社会学说开始在新式学堂中得到广泛传播。

(二)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1. 崇实学,增实科

四书五经、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有识之士呼吁学校教育讲求实学。1901年4月,刚走马上任不久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清廷,提出了“崇实学”、“增实科”的建议,认为“中国情见势绌,急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拟请“并仿下各行省筹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以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择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延师讲授,分门肄业”[3](卷九)。新式学校不再是科举的私塾或贵胄的特权。各行省多建学堂,授以实用之术,既开民智,又增强了国民的生存技能。后来袁世凯参与筹设的各类学堂章程,除了经、史学外,还有算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学、工学、商学、矿学、农学、医学、方言学、译学等新设实用学科,实科所占比例大大超过了传统的教学课程。比如北洋陆军武备中学堂,第一年除讲授经、史学外,还讲习算学、洋文、测绘、地理、博物、兵学、军器、操法,第二、三年授以兵学及步、马、炮、工、辎重各专门,与传统武术学堂只讲授刀、矛、弓、箭之术相比,明显先进得多。袁世凯在借鉴西方学制的基础上,将各种实用科学引入了直隶举办的各类学堂。

2. 突出武学

清末中国群盗入室,国土横遭宰割,国民惨遭蹂躏。在强邻交逼的时代,非凭武力,国家难保自卫,难图自强,所以“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3](卷九)。1902年4月,袁世凯上奏:“窃维当今时局,以讲求武备为先;整顿戎行,以遴选将才为急。臣观近日各营将弁,其朴诚勇

敢者,尚不乏人,然气质半属粗豪,文理尤多暗昧,其于军谋战略,平时既少研求,一旦临戎,往往张皇失措”[2](487页),这样的军队难以抵御列强的进攻。时局日艰,故“经武储材,尤为急务,不得不赶紧办理”[2](915页)。袁世凯深知将帅握有精良将对稳固其地位的重要。他借朝廷振兴戎政之机,大张旗鼓地筹建各种武备学堂。在“新政”时期,袁世凯在直隶创办有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保定参谋学堂、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马医军医经理军械学堂、大沽宪兵学堂、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北洋讲武学堂、天津电信学堂等。这些军事学堂培养出了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军官和士兵,素质高,战斗力强,这是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军事教育改革的成果。小站练兵及各级各类武备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

(三)加强新式学堂管理

1. 加强教育管理力度

清末新式学堂逐渐增多,但管理严重滞后。就宏观方面而言,缺乏全局上的总体规划,没有全国性的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就微观方面而言,不要说不同类型的学堂,即便是同一类型的学堂,在学制年限、课程设置、教材及师生待遇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于省城设学校司,为通省学务总汇之所。学校司置总办一员,分三处,即专门教育处、普通教育处和编译处,各处分置总办一员,分理其事,对端绪纷繁的学校事务进行专职管理,这使得各项学校事物的管理能有条不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按学务大臣奏定章程,改学校司为学务处。1905年8月,清廷发布上谕:“飭令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嗣后各该学政事宜,著即归学务大臣考核,毋庸再隶礼部,以昭划一。”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校情形不同,学校管理制度自然应该有所不同。1906年2月,袁世凯上奏并希望清廷“明昭创立学部,示天下以准绳”[2](1249页)。

为使全国学制整齐划一,袁世凯建议朝廷“定系统”、“定权限”、“行考选”。

第一,定系统。由学政考校各省学堂之事。复提学道旧制,设正学提举1人,专管各学堂教科

一事,副学提举1人,专司各学堂管理之事。各府设正副教授2人,各直隶州设正副学正2人,各州县设教谕、训导各1人。这样,每属2人,分掌教科、管理,职责分明,利于提高管理效率。第二,定权限。以前,学校之事,由学政统摄。现设学堂,督抚以至地方官也应配合学政担起责任。有关地方学堂的建置、扩充、革兴,提学道可与督抚共同协商,转飭本省学务处,责成地方官办理。这样,学官纠察之权与地方行政之权不相混淆,有利于整个管理系统的健康运作。第三,行考选。目的在于使“儒官无不谙学务之人,教职无坐糜禄食之事”[2](1251页)。即对现任教职,概令调省考验,除习过师范、研究学务各员外,老而无能者,“以原品休致”;年壮可培养者,入师范学堂,毕业后再行录用。对师范毕业的学生,予以举人、进士出身,由各省督抚查取毕业证照最优者,试补教授、学正,优等者试补教谕,中等者试补训导。行考选,慎选师资,能够保证师资队伍的质量。

2. 制定新式学堂章程

袁世凯还积极参与各类学堂章程的制定,备极周详。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的“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的“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试办章程”,同年七月的“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暂行章程”、“中学堂暂行章程”、“创设保定警务局学堂拟定章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的“北洋陆军讲武堂学兵营试办章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的“法政学堂章程条规”等。就一般大、中、小学堂或师范学堂章程而言,大都包含了四个部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

以“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为例。在学堂办法中对筹办此学堂的形势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在缺乏中、小学堂的基础上,试办山东大学堂只能分三等:一备斋,习浅近各学,略如各州县之小学堂;二正斋,习普通学,略如各府厅直隶州之中学堂;三专斋,习专门学。按理,大学堂只应设专斋,但因一时无所取材,却不可能设立专斋之课,而只能从备斋、正斋入手。除此之外,还对学生数额、入学资格、学习年限等作了规定和限制。在学堂条规中,首先要求学生宗圣尊主,其次明确规定学生的作息时间以及日常行为规范。在

学堂课程一栏内,按由浅入深的教学原则,对备斋及正斋学生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分别作了详尽安排。“各斋学生,每日均须将功课分校填注日记,功课余暇,均须练习体操,每月均须作中西文字,每年春秋季考两次”[4]。在学堂经费一栏里,要求对学堂各项开支作出估计,由政府拨款,飭令委员节约开支,力戒浮糜,以期持久。对章程的未尽事宜,还可随时增损,至于完美。

袁世凯的这篇“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二个月后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清政府降下谕旨:“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而淳淳于明伦理,循礼法,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资之道,著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4](卷一百七十)“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成为以后制定学堂章程的蓝本。

(四)重师资,倡游学

1. 重师资

袁世凯认为振兴教育,首重师资,“窃维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清末,无论在朝在野之人均主张兴学,但是旧式教育常常囿于章句帖括,于各种新学既接触不多,更难以讲求,因而“各州县现虽筹办学堂,而教习无人,课程无定,名为设学,实仍虚应故事”[2](581页)。学堂不多,不在于无款无地,而在于无教师。袁世凯认为应多派中学已通之士出洋就学,“分习速成师范及完全师范两种,尤以多派举贡生员为善,并于各省会多设师范传习所”[2](1188页)。袁世凯认为速成师范可救燃眉之急,实属变通之策,完全师范以应长时之需,待教习敷用时,速成师范便可停办。

为了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袁世凯还多方延揽通晓西学的教师,直接担任一些西学课程的教学;并聘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高等学堂西学总教习,委托其在天津大学堂学生中选拔优等生充当府设中学堂教习。为稳定、扩大师资队伍,袁世凯主张提高教师待遇。他上奏说:“学道清苦异常,应请从优给俸。原在四千两以上者,改为八千两。原在四千两以下者,改为六千两,俱按十成支放,永不折扣。”[2](1250页)。

2. 倡“游学”

为使长期封闭的中国人了解世界,也为了减少清末“新政”的阻力,袁世凯积极主张派官绅出洋“游历”以及派学生出洋游学,同时号召有条件的学生自备资斧出洋游学。1901年4月,袁世凯上奏:“拟请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务之京官随从游历,考究各国政治、学术、工艺、风土、人情,既资以广见闻,亦藉以觐敌视。濡染既久,智慧日生,外洋情形,均得要领,回国任事,自然措施,遇有交涉,更无难于因应。”[3](卷九)后来,袁世凯更明确指出:“欲求民智之开,非由官绅入手不可”,“方今时局更新,惟有上下一心,博采邻邦之良法。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留学在清末已成为一种趋势。有的省份已率先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廷发布上谕:“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一体仿照办理。”[5](卷一百六十九)袁世凯响应清政府号

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而且重用归国之士,陆续派办洋务及师范、实业各学堂、局、厂。虽然袁世凯并非近代留学教育的创始人,但他积极推动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清末的教育改革。

袁世凯作为清末的一位权势人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广建学堂,普及教育,对清末教育改革作出了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探索。“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3](《养寿园奏议辑要跋》),他的兴学育才主张及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封建的大官僚,其办学的目的当然仍是维护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从其试办章程中,可以知道其学堂的性质“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术为用……庶先明其体,后达其用”[6](卷五《学校》上)。这说明袁世凯设立学堂的宗旨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参考文献:

- [1]与同志书[J].游学译编:第7册[M].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
- [2]天津图书馆,等.袁世凯奏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 [3]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M].项城袁氏宗祠藏刻本,1937.
- [4]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上海:中华书局,1958.
- [5]学校上[A].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6]学制演变[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Yuan Shikai and the Education Reform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LIU Ju-su¹ XIANG Yong²

(1. History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Politic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Leshan, Sichuan 614000, China)

Abstract: Yuan Shikai, an influential figure in the education reform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dvocates abol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opularizes new types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projects school management.

Key words: Yuan Shikai; education reform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 old-style school